

#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 |     |     |     |     |     |
|-----|-----|-----|-----|-----|
| 巴曙松 | 蔡继明 | 陈东琪 | 陈栋生 | 陈全生 |
| 程恩富 | 迟福林 | 戴圆晨 | 范恒山 | 樊纲  |
| 高尚全 | 顾海兵 | 葛志荣 | 谷书堂 | 贺茂之 |
| 洪银兴 | 黄范章 | 贾康  | 江春涛 | 金碚  |
| 李成勋 | 李江帆 | 李京文 | 李维安 | 刘诗白 |
| 刘伟  | 茅于軾 | 任玉岭 | 宋洪远 | 宋守信 |
| 宋养伟 | 谭崇台 | 王东京 | 卫兴华 | 魏杰  |
| 吴澄  | 徐长友 | 晏智杰 | 杨家庆 | 杨高先 |
| 张曙光 | 张晓山 | 张卓元 | 赵人伟 | 郑新立 |
| 朱铁臻 | 周叔莲 | 周天勇 | 邹东涛 |     |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戚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常务) 白卫星  
编辑部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何超

第 109 期(总第 222 期) 2015 年 7 月 26 日 星期日 乙未年 六月十一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罗“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 从 500 强看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

李锦 特约评论员

作为衡量全球大型企业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榜单,《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的公布,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和坊间的热烈讨论,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转向了中国企业。

7 月 22 日,2015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新鲜出炉。中国有 106 家企业入围,连续 5 年成为除美国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年增加了 16 家,去年 5 家,今年增加 6 家,如果继续在世界 500 强中保持这样强劲的发展势头,将在 2020 年赶上或者超过美国。中国的世界 500 强企业快速增长符合历史走势,大企业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命运。

值得一说的是,中石化排名超越壳牌石油位居次席,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占据榜眼位置,中石化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企业。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排名未发生变化,继续位居榜单第 4 位和第 7 位。上榜的中国企业的排名大多保持上升态势,其中中粮集团排名上升 129 位至第 272 位,上升速度仅次于美国航空集团;招商银行排名由第 350 位大幅上升至 235 位。有 5 家中国内地企业首次上榜,分别是:陕西煤化工集团、中国光大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保利集团、海航集团。我对新华社记者说,上榜企业持续增多、排名普遍提升,说明中国企业在做“大”的方面仍保持着高歌猛进的良好势头。这说明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这是我强调 4 年的观点。

7 月 22 日,2015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新鲜出炉。中国有 106 家企业入围,连续 5 年成为除美国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年增加了 16 家,去年 5 家,今年增加 6 家,如果继续在世界 500 强中保持这样强劲的发展势头,将在 2020 年赶上或者超过美国。

大企业时代还体现在中国企业 500 强与世界 500 强、美国 500 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在 2002 年世界 500 强企业中,美国、日本分别占有 198 席和 88 席;在 2015 年世界 500 强中,美日企业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充分证明,中国企业已经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以往由美日主导的局面正在向美中倾斜。

### “大企业时代”的六大特征

兼并重组是促成中国进入到了“大企业”时代的重要推手。2012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 154 家大企业共并购重组了 1111 家企业,并购重组活动持续活跃。在西方企业的发展历

程中,已经掀起了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五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每次浪潮的掀起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西方企业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现代工业第六次兼并重组浪潮可能由中国大企业带头完成,兼并的主角是中国大企业。在中国,国企显然充当了大企业兼并重组的主力军。今后几年,仍然是重要特征。

“大企业时代”形成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具有六大内在特征:

首先,大企业时代对工业生产组织形式而言,生产和资本出现了集中的趋势。这些大企业往往控制着一个或多个部门的生产经营,甚至可能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其次,向世界市场加快发展,进入国际化竞争时期。国际化竞争就是国家大企业之间的竞争。第三,大企业时代对生产力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一些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形成了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一些产业链相关企业合并重组,促进了企业业务链条整合,发挥了协同互补效应;等等。第四,导致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大企业产生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适应了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第五,兼并重组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形式。第六,与此同时,产生大企业时代的商业模式与文化,宋志平的包容和谐文化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决定企业的命运。稻盛和夫与宋志平,是仅有的同为两个世界 500 强企业的领袖,他们都有一种文化在支撑,他们为“大企业时代”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依据。(下转 02 版)

## 军营中走出的经济学家群体

白卫星 本报副主编

军营不是学校胜似学校,既锻炼人才,也培养人才,其中就培养了不少书法家、理论家、艺术家。在我国规模不大经济学家群体,也有一些弃武从文的经济学家,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就不乏早年参加革命的军人。比如,华耕漠曾任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东兵团后勤部部长;杜润生曾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1947 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及淮海战役;宋涛于 1939 年参加新四军;何伟 1944 年在晋察冀军区三纵队兵站任站长,后调冀中军区参加平津战役;施正一 16 岁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解放云南的战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8 周年来临之际,我想简要谈谈从军营里走出的经济学家群体,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经济学家。因为我曾经也是军人,我在兰州军区守备师当兵时,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是我的领导——师参谋长。因此,我对有过当兵历史的经济学家有一种特殊情结,自然也就格外注意经济学家的军人履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1971 年,刘鹤下乡当“知青”,后便入伍,在 38 军服役。在那个年代当同龄人还在边远地区插队时,刘鹤能加入“王牌”部队,无疑是幸运的,对丰富他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刘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主笔的《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因此被调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此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 11 个国家产业政策,其中 5 个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他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还参与了“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前不久,他又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管益忻教授有 20 多年的军旅生涯,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早在 1980 年,管益忻作为军队代表,参加了由于光远等发起召开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2007 年,他推出多年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毛泽东兵法与企业战略管理”,首创毛泽东兵法的商战应用。他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同“客户经济理论”是一致的。商战第一位的“敌人”是客户,其次才是竞争对手。像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歼敌有生力量,打开灭战等兵战思想,同企业经营的核心竞争力、强化市场占有率思想、市场细分策略等是相通的,并且是被若干家企业实践证明的科学有效的战略思维。出版专著,开创性地推出“企业要经营客户消费”的“(经)营消(费)”理论。1938 年出生的管益忻先生迄今身心健硕,思维活跃,论著已逾 2500 万字之多,至今主持《经济学家周报》,并于最近在美国哈佛大学库珀教授对话中推出“大制造”新理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于 1976—1983 年在兰州军区 20 师(后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第 1 师)服役,历任战士、副班长、文书、营部书记、政治部干事。1978 年高考以宁夏自治区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86 至 1991 年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室工作。1991 年至 2001 年在美国工作和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和发展金融专业博士学位。他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金融理论。他 2006 年率先提出“定价经济”理论,所撰写的《金融创新与定价经济形成》为定价经济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2010 年提出的长链金融理论对定价经济学作出进一步论证。

刘树杰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公用事业改革与监管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并直接参与了部分相关政策的制定工作。刘树杰是空降兵,他说“当时在部队,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书看得多了就想写东西,进入部队报道组后,开始学着写消息、通讯、评论。刘树杰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看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而发的,稿子发表在当时的《空军报》上。在部队期间,刘树杰曾读过著名经济学家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有的东西懂了,有的似懂非懂,

这样最能激发求知欲,特别想弄懂它”,从此开始对经济学有了兴趣。高考时,刘树杰发现吉林大学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就报考了这个专业。在部队的业余时间,刘树杰最愿意看书,也有时间看书。客观地看,当兵的这段经历对他日后考大学及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1 年入伍的林岗发表了几篇理论文章后,于 1977 年《解放军报》将他借调到理论处,之后他被正式调入报社当了一名理论编辑。那时正值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时期,林岗接触了很多新的观点,广泛浏览中,他对经济产生了兴趣,“年轻时读书就是靠兴趣,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有关经济体制方面的争论特别多,我就注重读经济学的各种论著。”1982 年,他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后,林岗又回到《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87 年,他再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吴树青教授的经济学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1995 年任副院长,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奉献在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教育岗位上。林岗主要从事所有制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方法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

迟福林 1968—1976 年在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任宣传干事,1977—1984 年在国防大学政治部任宣传干事、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16 年的军旅生涯主要是做宣传工作,这是迟福林学术生涯的基础。迟福林的视野非常广阔,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改革发展,具有超前性、战略性和对策性。他作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负责人,主持了许多改革热点问题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蜚声海内外,并成为中国改革研究的重要基地。

现任山东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臧旭恒教授有 5 年的当兵经历,他真正的人生成长是从步入军营开始的。1970 年冬,臧旭恒成为某军火箭炮兵团的一员,负责部队新闻的通讯报道。在这个时期,他采写的大量文章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中央及新闻媒体刊发。五年多踏实勤恳的军营历练,不但为臧旭恒赢得了许多的嘉奖,也在潜移默化中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臧旭恒的研究领域是产业经济理论、消费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分析和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经济的理论贡献比较突出。

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经济、公共经济、宏观经济和发展问题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多次参与有关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课题的研究。近年来主要注重中国公共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研究,发起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并担任会长。韩康教授 1971 年入伍,在 24 军 70 师任班、排、连、营职干部,1978 年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教员,有 10 年的当兵历史。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当年为了参加高考,主动提出复员。1972 年,王广谦穿上军装,先是在泰安军分区警卫连当通信员,后来大部分时间当文书。“文书这个岗位训练不苦,晚上看书可以看得很晚,连部的一个小图书室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把里面的每一本书都看遍了。”那个年代,王广谦似懂非懂地读起了《资本论》,又一点一点地“抠”《毛泽东选集》,还做了 20 多万字的学习笔记。“那时候,虽然社会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但我对国家、对我身边的人却一直心存感激,我总觉得我欠社会的,应该尽我的能力去报答,去贡献我的力量。当 1978 年初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提出了复员申请,想实现小时候就萌发的大学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和他的接棒者金碚都曾经是军人。1970 年 2 月,吕政结束南京军区部队农场锻炼,被分配到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队从事军需工业生产技术管理和企业技术革新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金碚于 1971—1975 年在解放军空军北京军区航空兵部队服役。吕政说过:“大学毕业到军队虽然是文革时代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再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根据我个人体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知识分子,并不是浪费青春和虚度年华,而是十分有益的磨练。”在军需工业战线 8 年多的实际工作,使得吕政对工业经济和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也为他在 1978 年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及后来专业从事工业经济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记得 1997 年在《生产力研究》杂志刊过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宗胜的自传,他是山东省乳山市人,也是当过兵。具体服役时间需向陈宗胜先生咨询。(下转 02 版)



## 互联网颠覆传统制造业概念

管益忻 本报主编

前不久我用了 10 天的时间到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纽约转了一遍,在哈佛大学同美国的库珀教授做了一个对话,在洛杉矶的中美文化产业交流论坛上做了一个演讲。在同库珀教授对话中我提的一个新概念,制造业不是奥巴马总统讲的“再制造”,而应该是“新制造”。什么意思?就是制造业原来的概念覆盖太狭窄,制造业从工业化来讲,加工物质这是制造。现在我们互联网大潮来了以后,宽带、大数据、云计算,合起来叫 ICD,这是加工信息的,加工信息也是制造业。另外,文化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制造业。加工物质的大家好理解,加工信息往往觉得不太好理解。具体来说,加工信息的制造业很多的,但是加工信息研发服务,现在放到第三产业,严格讲这是不对的,这应该是制造业。所以,原先一二三的产业划分不一定是正确的,是有问题的。所以,还有洋品牌、信誉度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属于加工信息。

信息加工的加工对象主要是数据——马云一再强调的数据,现在石油资源不是主要的,而数据资源是最重要的——加工对象是数据,加工公司应该是一个生态系统。美国第七舰队在太平洋那个平台本身没有多大作用,但是平台上的飞机起什么作用,实际是一个生态系统。信息加工的关系发生变化,不再是公司雇佣员工,而是员工雇佣公司。这个话最早是多伦特说的,这一点特别宝贵。谁头脑里掌握了资源,谁是为主导的,公司倒过来要求你,雇佣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个未来加工业态的发展,将来从 IT 到 DT 过渡,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IT 是以企业为中心的,DT 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这个已发生了大变化。当然,还有产业集群。

我想讲一点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我在洛

杉矶专门讲了打造 2.0 版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发展模式,有十个战略转变。第一,我们在产业环境认定上要向个别产业认定、向全覆盖转变,文化创意产业不是如同纺织、水泥、钢铁业这样个别产业,不是个别产业,它是覆盖所有产业的产业。

第二,文化产业的创意化本质。第一条就是创意元素的双重,这些都属于创意化的本质问题。我们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基本上没有开掘文化创意的元素、元素链条。每一个工艺流程,每一个节点有一个创意问题,把那个突出出来(以后)就是文化创意的链条——我们现在基本没做这个。在价值观上要从 GDP 向以人文价值为主导多元化认证转变——文化产业 5% 的产值这非常错误的,文化创意产业不是仅仅 5% 的产值。我想分三个问题来说,第一是绝对意义上的人文价值观。在一切产业当中,只有文化创意产业是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是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所以,它是覆盖所有产业的。第二,相对意义上的创意价值计算问题,这个可以说直接文化创意产品的价值,衍生产品的价值。第三,文创产业的附加价值,品牌创意的附加价值,整个流程的附加价值,节省用工的附加价值,这都是价值,我们原先没计算。

第三,在市场机制打造上,要从企业说了算向用户说了算过渡,020 的实质就是从用户中来,回到用户中去。这一条非常要紧。成功的市场运作不但要自上而下,尤其要自下而上。一个平台终究还是用户创意为主导,我们过去总想企业自己的创意,但第一位应是用户的创意,把用户的创意拿来,根据用户的创意进行企业的创意来操作。

第四,在金融业创意视角上要从单纯金融向创意金融视角转变。我们要解决创意金融。刚才提了好多问题。大趋势就是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大运作就是搞好互联网

金融的创意,SAT 的一般创意,把握人的生活习惯,消费偏好的创意,破解信息不对称中的创意,等等。

第五,在创意文化上要从后发式粗糙的认识向深层次高精度的认识转变,在创意的历史上要从单层面的单视角的向多层面的多视角转变,具体有三种形式我就不多说了。创意概念要从单一化认定向多元化认定转变,一种是被动式的创意,再一个是主动的,器物性的创意,像现在的 3D 打印是直接结合的。第三种就是文化创意,价值观创意。

第六,在其他产业合作方式上。要从互联合作向着具体有效的机制协同转变。研究协同机制问题,这里面从资产的性质来讲,要从重资产为主向轻资产为主转变;运用方式方面要从重多元向突出主题转变。我们现在文化创意产业生产也搞,但是抓不到主题,再一个要从单纯的一个事业向着控股公司多元发展。

第七,互联网+机制打造上。从产业引领、定义、生产力创意上着手,其融合机制打造要从创意主导融合来着手,在发展视野上要把走出去向全球化转变,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国门。我们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去形式化的关联研究不多。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创意设计问题。

第八,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要同产业集群的历史文化、可感知路关联。

第九,创新机制上要从熊彼特创新、弗里曼创新,向 4.0 新的创新过渡。历史上熊彼特创新,弗里曼创新,现在 4.0 新的创新。

第十,在产业园区打造上,从非创意产业主导向创意产业主导转变。

### 更正

本报 7 月 19 日一版文《纪念戚思危先生》的作者有误,今更正为“本报编辑部”。